

## 第二章 黄埔参军

### 国共合作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毅然决然改组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启发下，认识到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始终会被一般军阀官僚把持国家，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真理，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作为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它的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为什么又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呢？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华里，当时的小汽船一小时可到，全岛周围约二十余华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所在焉。以前曾为广东陆军军校及海军学校旧址。孙中山以其四面环水，与城市隔绝，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军官学校校址，一般简称为黄埔军校。

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于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忿然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什么孙中山当时那样器重蒋介石呢？有简要说明一下的必要。孙中山与蒋介石以往的关系，只是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普通

党员的关系。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属下当团长。陈其美死后，他也就失势了，其后他到广东、福建在粤军总司令部（那时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许崇智是军长）任过作战科主任、支队司令参谋长等职，虽与孙中山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但并未被孙中山所重视。因为蒋介石在党内资历较浅，也没有显示他的才智有过人之处。蒋介石在许崇智部混了几年，郁郁不得志，乃跑回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突然背叛孙中山，指令其广州的部属叶举等包围设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并进行炮轰（那时陈炯明本人在惠州），孙事先得到粤军中的几个军官的多次密告，于深夜化装逃出总统府，得温树德海军总司令及所属海军部队的拥护，登永丰舰（以后改称中山舰），与叛乱部队对抗。蒋介石在沪得此消息，立即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在永丰舰随侍，颇多策划，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才共同离穗，经香港赴上海。事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一开头就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等语，随后孙中山又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由此可见孙对蒋之器重。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又继而任命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鵬、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在省城南堤二号设立筹备处，二月六日正式成立，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个部，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理）、林振雄、俞飞鵬、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筹备处自成立至五月初学生入校后，便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至于各级干部的来源，除校级人员多系由各方推荐外，下级干部大部分系由西江讲武堂毕业学生中挑选来的。

## 考入黄埔军校

我们以为到广州时想必有人接待，安排好食宿，不料到了长堤码头，并没有人来照拂，真是大失所望，广东话又听不懂，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七问八问，总算找到了一位会讲普通话的本地人，他看我们这些人的穿着和行李都十分简朴，便介绍我们到华宁里的客栈去住，说那里便宜，我们雇车去了。这条巷里除住家的外，有十几家小客栈，每所客栈约有七、八个房间，每间可住三、四人，我和陈赓、萧某（忘其名。此人以后没有进黄埔军校，也一直不知他的下落）同住一室，三人情同手足，每天除看看书报外，总是一道出去游公园、逛马路。在长沙招的一百多人，陆续来到广州，大多数都住在华宁里，每天食宿费为广东毫洋四角（一块银元可换毫洋一元二角），可是事情真奇怪，我们到华宁里住下一个月了，从没有人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带的旅费都有限，眼看就快用完了，大家都焦急彷徨，总得想个办法才行，随即打听到了程潜的军政部所在地，通过会商，一致公推陈赓、李默庵等人为代表去见程潜，程潜答应自即日起发给我们食宿费，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也知道了李明灏到湖南招我们来广州是程潜想招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要招的，为此，大家不免感到失望。但既然远道来到广州，也只好随遇而安，听其自然发展了。大约到了三月初，李明灏来和我们谈话，说程潜部长决定要办一个陆军讲武学校，地点在北校场营房，正在修理中，一俟修好，就把我们这些人搬进去受军事训练。未去以前，先搬到关帝庙（在越秀公园的东北角）里暂住，自己起伙可以省一点，管理也比较容易些。这个关帝庙荒芜已久，头几天我们天天去打扫，随后搬进去住下，没有床铺，也没有木板，就睡在铺有稻草的地上。

我们一百多人搬进关帝庙里住下后，除早晚点名外，仍然是

闲着无事。有一天，我和陈赓外出散步，沿着珠江北岸的长堤悠闲地走着，走到南堤码头附近，忽然看见有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我们仔细读完后，商量一下，决定报名应考。招生报名处就在码头附近的一所两层楼房里，报名条文中规定要十八岁以上的，那时我刚满十七岁，但按中国旧的算法，满了十七岁就可以说是十八岁了，所以我就填上十八岁。三月二十九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心想象我这样一个中学（那时是旧制，规定四年毕业，不分初中高中）还没有毕业的人能考得上吗？不免有些忐忑不安。考试一开始就是作文，题目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

（大意如此，原题记不准了），正好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考试完后心情是不平静的，能不能考取？总在脑海里打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发榜，一直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发榜公布，陈赓和我都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早在二月十日已分配，原定招生三百二十四名，计东北三省加热河、察哈尔（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共十五名；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十二名，共一百六十八名；湘军、粤军、滇军、豫军、桂军各十五名，共七十五名；国民党先烈家属二十名，尚余十一名，另招备取生二十名至五十名。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统治之下，不便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sup>①</sup>

<sup>①</sup>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秘密招考的，当时要有两个国民党党员负责介绍才能报考，不少学生是在中国国民党上海办事处（法租界环龙路44号）报名，在该处初试录取后，再到广州复试录取入校的。

三月二十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委员。三月二十七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改称中山大学）为考场，举行入学考试，各地投考的学生共计一千二百余人，三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放宽录取，计正取生三百五十名，备取生一百余名。我们入学后，西北三原的于右任，介绍三十多人来校，未经考试即编入第四队，不在上数之内。

## 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南堤码头附近集合，由几位负责领队的官长清点人数后，即分登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着驶往黄埔，约一小时到达。正取生共编为第一、二、三三个中队，我编在第一队第三区队，陈赓编在第三队。五月十日备取生一百二十名进校，编为第四队（第一期学生有四个队，第一队队长为吕梦熊，后为陈复，第二队队长茅延桢，第三队队长金佛庄，第四队队长严凤仪），总计学生四百七十名（加于右任介绍来的三十余人，实为五百零几人），总称为学生总队。

学校校舍是利用原广东陆军学校旧址，由于久置不用，房舍颓废，筹备期间曾大加整修。至于原海军学校的旧址，系在北面，与本校相毗邻。校舍大部分是一楼一底，一间寝室有的住二、三十人，有的住七、八人。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从入学之日起到六月上旬，约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操练，即学会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动作，如立正、敬礼、集合、整齐队伍，正步与跑步等等。半个月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蒋介石对大家讲了发枪的意义，然后由队长讲解步枪的性能，各部分的名称，并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军队要求动作迅速，所以吃饭及上厕所等，都受时间的限制，每天的生活确是十分紧张的。

大约是六月上旬，廖仲恺党代表对我们作了一次入党动员讲话，大意是当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增无已，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无日不战，弄得民不聊生。孙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这样一个党员从事斗争，是很有意义的，是光荣的……。讲话完了后，廖党代表又耐心地说明入党申请书的填写方法，讲到要有两个入党介绍人时，廖党代表说：“你们对于队上的官长和同学，可能不知道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我们两人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就是这样写的，可能同学们都是这样写的。入党申请表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过了几天就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 开学典礼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上午八时，来宾及本校官生齐集大花厅（有说在大操场）参加典礼，来宾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次长胡谦，外交部长伍朝枢，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广东民政厅长孙科等人。孙总理偕夫人宋庆龄女士莅校，孙中山身穿白色中山服，戴着“拿破仑”式白帽子，精神奕奕，态度安详。九时许孙先生和蒋介石、廖仲恺登台，举行开学典礼，中山先生作了约两个多小时的讲话。根据记录发表的全文约一万多字，现就所讲创办本校的目的和意义择要记述如下：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开办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的年号，没有民国的现实。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败的。

2. 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组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3. 我敢讲一句，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们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

4. 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建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功告成，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民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的事业。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既到这个学校里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 军 校 生 活

大约是在七、八月间的一个深夜，大家睡得正熟，突然听到区队长大声叫唤起床集合，并要每人带上洗脸盆，由队长带着队伍向海军学校旧址跑去，原来是房子着火了，火势越来越猛，全校师生职工，在没有灭火器也没有水泵带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

投入救火斗争。一部分人爬到楼上和房顶上，拆除一些砖头木板阻止火势的蔓延，大部分人自动组成十多条长龙，用脸盆、水桶从海边取水，迅速传递，向火焰泼去，这样奋战了大约三个小时，火被扑灭了，房子只烧掉一个角，大部分得以保存。这所房子是本校的印刷所，存放着一些器材，住着部分职工，这次火灾损失不大，也没有伤亡。只是爬在屋顶上救火的同学，有几人受了轻伤。我们回到寝室时，已快天亮了，总队长宣布上午不出操，要大家好好睡觉。下午本来是要上课的，队长传达停止上课，三点钟集合，听候校长和党代表讲话。集合完毕，蒋介石和廖党代表缓步走过来了，他们站在楼上，满面笑容，两人都十分高兴地表扬了这次救火行动，说这种迅速、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的表现。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消灭敌人，完成革命……大家受到这番奖励也很兴奋。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时，由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顾问团，随后又派来了以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总共有多少人，我不清楚。他们大都住在广州市东山顾问招待所。人们又称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军事顾问团，可能是受鲍罗廷领导的。我们在学校受训期间，加伦将军很少来校，但派来几个校尉级的军官协助训练，只记得为首的一个叫蔡顾问。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军事训练，讲解由苏联运来的武器，如重机枪、山炮等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还从日本雇来两三个日本陆军军士，专门教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动作。这几个日本军士，教练三个月左右就走了。至于战术、兵器、筑城、地形等教程，基本上都是采用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那一套。

商团事件发生后，广州谣言纷起，控制着广州大部分地区的滇军，与商团早有勾结，妄图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其中有一个叫范石生的军长，狂妄地声称：“黄埔岛上那几百学生是不能打仗的，我派一营人去就把他们解决了。”针对这一情况，自八月下旬起，全岛实行警戒，岛上兵力，除长洲要塞司令部有一



连卫兵外，只有五百名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因此我们白天仍照常上课操练，入夜即分区担任戒备，严密注视江面船只的行动，每人站岗四个小时，然后回校休息。学校还发给每人两个馒头和一块熟肉作夜餐。虽然较平日睡眠时间少些，辛苦一些，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环境的艰险，因而革命的积极性很高，斗志旺盛，没有人有怨言，更没有人有畏缩情绪。岛上的戒备一直到商团事件完全解决后才缓和。

这个军校与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其他的讲武堂，讲武学校的主要区别，就是重视政治训练，是为革命而创办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要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作根本，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创办之初，就是仿效苏联的红军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可以说是一个新型的学校。中山先生亲派廖仲恺为校党代表，是非常适当的，因为廖仲恺先生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戴季陶虽然也跟孙中山多年，但他是个右派，反对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任学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就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中山先生甚为不满。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甚密，即劝其辞职离粤去沪（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基本上就是以戴季陶思想为主导的），由邵元冲继任。邵是一个书呆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平淡得很。及至十一月间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循循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他大力加强政治工作：1.经常请些人来作报告或讲演，如知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以及国民党的汪精卫（汪当时称为左派，善于辞令）、胡汉民、孙科等，他们来讲话的时候，多在大花厅里进行，听众经常挤得满满的。周主任也常为大家作报告，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透彻精辟，增强了大家对革命前途的信心。2.成立政治学习小组，周恩来主任亲自主持挑选一批准备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分子。3.成立“血花剧社”，表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对此大家都很有兴趣，学校的

文娱生活大大活跃起来了。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又是一个演员。4.我们集体入党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特别党部，周恩来是特别党部委员之一。这个特别党部与政治部相配合，积极对党员进行革命教育。

## 平定商团叛乱

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培植革命势力，不仅为国内军阀所畏惧，且引起帝国主义的嫉视，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勾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一方面又勾结在广州的陈廉伯，以谋倾覆革命政府，扑灭革命势力。陈廉伯为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团团长，在广州极力培植商团的力量，秘密组织会党。英国人复而怂恿之，甚至吹捧陈廉伯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因此陈叛志益坚，乃在香港暗中订购武器，与德商顺金隆洋行密谋，以“哈佛”号轮船悬挂挪威商船旗号运载军械。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以商团购械的名义，欺蒙政府，请得护照，历时不过四天，而九千余支的枪械已运入省河，其中有手枪及手提机枪多支。孙中山先生得到派驻香港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发觉阴谋，遂手令军政部吊销其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械船。八月十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命令，着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兼任）即飭江固军舰迅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当晚蒋介石派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舰赴沙角向运械之挪威商船交涉一切，翌晨发现该船已移动，停泊于白鹅潭，乃由永丰、江固两舰将该船监押到黄埔，泊近校门，严加监视，旋奉大元帅令，将是船枪械全行提出扣留于本校。黄埔位于珠江下游，江面颇宽，大船只能停泊于江的中心，乃派我们这些学生分乘小木船前往提取枪械，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把全部枪械子弹等运完。经清查军械数目与护照数目不符，足证商团私运军火之阴谋。陈廉伯等见事已败露，乃狗急跳墙，强

迫商店罢市，要挟政府。

英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商团，一开始只是暗中唆使，及见商团计败，形势不利，乃撕下它的假面具，公开进行威胁，当扣械开始时，驻广州英总领事竟公然出面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向广东政府提出警告；二十八日，再次向大元帅府发出一类似“哀的美敦”书之最后通牒，措词荒谬，其中有“闻华军将袭击商团，如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等恫吓语，孙总理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决定于九月一日发表对外宣言，并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英帝国主义者经孙总理抗议后，稍戢其狂妄，而当时驻在广州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阴与商团勾结，以图不轨，假借以第三者调停名义，从中作祟，是时政府以环境恶劣，不得不委曲求全，勉强允纳调停之议。十月初，命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谕，要他们通电表明自卫心迹，服从政府，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许遵办。十月九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发还枪支的命令，遂于当晚将长短枪五千余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十月十日商团运输发还的枪械，在西壕起卸，适是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学生及农工团体举行国庆游行，要通过该地，商团监护起械的团兵，竟不许通行，游行群众不服，正据理力争时，团兵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继而对伤者复加惨杀，挖腹摘心，备极残虐。第二天，商团联合会竟然散发传单，诬蔑政府，商团总部亦发出布告，有所谓“本团派团兵巡行，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又迫令商店一律罢市。且一面宣传东江陈炯明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韶交通（广州至韶关），使广州局势十分严重。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率师北伐，进驻韶关，蒋介石曾多次去电，请其班师，巩固省垣。孙得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等迅即运去韶关。蒋介石认为广州是根据地，十分重要，一再请求孙总理回师平乱。十月十四日孙中山

乃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下列命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装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大本营警卫部队，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十五日蒋介石乃督率所指挥的队伍，进攻商团，于清晨四时开始发起攻击，战到午后一时半，商团支持不住，纷向西关溃奔，我军占领商团总部后，继续向退集西关的商团围攻。十六日晨六时，蒋介石获得情报，谓商团已要求佛山、虎门等地的商团、民团袭击黄埔岛，因此学校立即特别警戒，兼设临时指挥部，蒋介石为指挥官，何应钦、王柏龄副之。溃退到西关一带的商团，被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攻打益急，商团士兵多系商店职员组成，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无作战经验，至此时已有不少人携械或弃械逃匿，陈廉伯见形势不利，逃到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馆。十六日下午五时，商团副团长李颂韶等为代表，到蒋介石的指挥部请求停战，我军坚决表示必须全部缴械，方可谈其他问题，最后他们表示愿意缴械赎罪，我联军允其所请，一律缴械，第二天全市商店复市。这一严重的商团反革命事件，为时一个多月，至此才告平定。我们第一队已于九月十二日奉命随侍孙总理去韶关，未能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

### 孙总理视察军校

一九二三年北洋军阀曹錕在北京用贿选办法窃据总统职位，吴佩孚助曹为虐，孙总理认为有讨伐之必要；又因滇桂军盘踞广州一带，把持财政，不听指示，因此想乘北伐之机调出粤境，以消除隐患，故孙总理毅然主张北伐。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孙总理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亲自出发赴韶关督师，蒋介石派学校中校战术教官文素松率领第一队护卫孙总理前往韶关。孙总理到韶关后，部队接受命令，向韶关集中，愿意出师北伐的，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总共

不到三万人。而杨希閔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仍盘踞广州及附近各县，不听调遣，使孙中山先生十分愤懑。

孙总理的专车停在韶关车站，他和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专车上，我们第一队住在离车站约两华里的一所用木头和竹子盖成的宽敞的房子里。我队每次派四人到专车附近担任警卫，其余大部分时间仍从事军事训练。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简述如下：

在十月间的一天，孙总理让文教官和陈队长（陈复）在附近选择一个高地，把队上学生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防守，一部分攻击，孙总理将亲来观看演习。文教官等将地形选好，作好了攻防计划，并叫我们实地演习了一次，然后去报告孙总理，第二天上午，中山先生大约九时左右乘轿子来到了山顶。这座山高约八百多米。我们第三区队担任防守，一大早就来到山顶周围挖散兵壕，布置防御；第一、二两区队担任攻击，于九时许从山麓发起攻击。十时半演习完毕，孙总理集合我们讲话，首先赞扬了我们演习中勇敢沉着的精神，然后说到做一个革命军人，第一要抱有救国救民的大志，毕生为这个目的而奋斗。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革命军要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讲话约半个小时。

十月中的一天，天气晴朗，风光明媚，孙总理兴致勃勃地要去游览“六祖庙”，我们随同乘专车南行三十华里，到马坝下车，孙先生和夫人均坐轿子，我们前后护卫，走了四、五华里即进入山口，又曲径通幽地走了约两华里，然后豁然开朗，见有一块田坝约数百亩地，群山环抱，树木葱茏，风景优美，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我国有句成语“天下名山多僧居”，信不诬也。中山先生夫妇游览了庙宇，仔细看了六祖盘坐圆寂的躯体，向方丈详询了种种情形。我们都在庙里午餐，直至下午五时才回到韶关。

商团叛乱事件解决后不久，廖党代表来到韶关，向孙总理汇报情况并请示，他还特地步行到我队驻地看望我们，一一询问我

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待人的谦和，态度的恳切，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东北的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分兵六路进迫关内，至十月十七日发生榆关大战，曹、吴的直军失败。二十三日冯玉祥自古北口班师回到北京，并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通电主和，曹锟被迫下令停战，并免除吴佩孚的军职。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中山先生鉴于形势的变化，乃决定停止北伐，并准备启程北上，我们于十月底随侍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旋即返校。

孙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后，积极准备北上，由于他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很大，特于十一月三日来校视察，并作告别的训话，广东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亦由广州乘船前来参加。中山先生对我们讲话约一个多小时，用他的话来说，是对大家的临别赠言。主要内容有两点：1. 北方这次发生的事变，不能算是中央革命，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官僚军阀之手。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是想借这个机会，大做宣传，联络各省的革命同志，建立革命的基础。2. 中国革命十三年来，都是不成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不远千里来这个学校求学，对革命抱很大的希望，有很大的抱负；广东大学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来到黄埔，听我讲革命的道理，研究革命的方法。大家希望革命成功，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十一月十三日孙总理乘轮北上，是日正午途经黄埔，蒋介石、廖仲恺率全体官生士兵整列校门码头迎接，孙总理又莅校视察。这一天正值第一期学生正在鱼珠炮台圩演习战术实施，午后二时，孙总理偕蒋、廖等亲往视察，见学生们精神饱满，动作娴熟，甚为欣慰。视察完毕后，即对蒋校长、廖党代表说，本党主义的实行，希望寄托在本校的学生身上。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今天看见我的学生有这样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

神，定能继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愿，所以我这次北上，虽死也可以安心了。从中山先生这段话来看，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否则象他这样一位年仅六十岁的伟大的革命家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 成立教导团

第二期学生系陆续由上海广州各地考取入校的，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学生队第五队及工兵队相继成立，到十月、十一月又相继成立炮兵队、辎重兵队、宪兵队，所以第二期学生分步、炮、工、辎、宪兵五科。由于学生日渐增加，原有校舍不敷使用，除增设楼房数座于本校毗邻的海军学校旧址外，并在岛上的平冈及蝴蝶冈两地建筑临时房舍，各驻学生数百人。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接收陆军讲武学校全体学生共一百五十八名（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都是湖南人），编为第六队。一九二五年二月，教导一、二两团出发东征，经淡水战役后，前线急需下级干部的补充，由于第六队受训时间大体与第一期学生相等，因此作为第一期学生同样待遇，并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结业后，赶赴前方。所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实为六百五十人左右（本应为六百六十多人，因中间有十多人退学）。

本校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开始筹备成立教导团，同时继续招生，第二期约四百五十人，到第三期达一千二百多人，这样迅速的扩充，没有足够的武器是不行的。所用枪械的主要来源有两端：1. 平定商团叛变时缴获的长短枪约九千余支；2. 从苏联购运来的武器，有日本三八式步枪数千支，野炮、山炮二、三十门、重机关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约百多挺，以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记得是租用挪威的商船由海参崴运来的（有说第一期学生所用的是广东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驻节韶关时，深觉有成立党军

的必要，当时曾写给蒋介石一信，据云：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分（指所缴商团的武器而言），当以此事为准。蒋介石当即复中山先生一信，中有云“两个月内可练成一支劲旅”，孙甚喜慰。遂着手筹备教导团。

教导团的编制，计为步兵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即所谓三三制）。团部直属有特务连、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党代表，并设有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副排长各一。

蒋介石初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十一月二十日呈请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沈应时为第一营营长，陈继承为第二营营长，没有多久，陈继承他调，以刘峙接任，王俊为第三营营长，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植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到十二月成立教导第二团，原教导团改称为教导第一团，人事仍旧。十二月初任命王柏龄为教导第二团团长，顾祝同为第一营营长，林鼎祺为第二营营长，金佛庄为第三营营长。张静愚为教导第二团党代表，周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胡原在第一团），季方为第二营党代表，郑洞国为第三营党代表。

一般人往往以为黄埔军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两个教导团，几乎没有什么训练就去打仗，大概这些士兵都是广东人或者由广东的地方团队抽调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例如，我所到的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就一个广东兵也没有。这两个团士兵的籍贯绝大部分是河南、安徽、山东、苏北、浙江一带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蒋介石就派陈祖慧到上海法租界设立招募处，但应募之人不多，又于十月派王懋功、戴任、陆福廷三人赴沪募收北方士兵，定额五千名，这些新兵有些确实是当过兵的。



## 军校毕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我们全总队学生在鱼珠圩及珠村附近进行战术实施的演习，何应钦担任指挥，所有军事教官一律参加，实际上也就是对学生的考试。当时以校长、党代表名义下达命令，大意如下：第一期学生已届毕业，行将分派到教导团和其他单位服务，着各教官各队长将平日视察所得，按加确切考语，限于二十八日前呈报为要。二十九日宣布考试成绩，及格者共四百六十五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蒋先云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取得第一名。他是湖南新田县人，共产党员，毕业后先当连党代表，随后调到教导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我当时是第一排排长，约半年他被调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北伐战争打到武汉后不久，他调第四军叶挺师（那时第四军军长是张发奎）当团长，适张学良率领奉军主力向武汉进攻，国民革命军在河南驻马店一带，击退了奉军。蒋先云后于临颖战役壮烈牺牲了。

第一期学生毕业时，正值戎马倥偬之际，当时教导第一、二团已相继成立，新兵陆续到来，急需干部，遂宣告于十一月三十日毕业，但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仅蒋介石对大家讲话，勉励要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要刻苦耐劳，作士兵表率，对士兵要爱护，不可随便打骂等。当日即行分发，我被分派到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副排长。

## 第一次东征

陈炯明叛变败退后，仍盘踞东江潮汕一带，阴谋再起，孙中山先生每欲亲征，予以彻底消灭。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不幸于次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逝世。但中山先生的遗愿——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实现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分配在教导团工作，任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为排长。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和教导团，目的在于培养党军的干部和树立党军的基础。因此，我们这支部队当时有“黄埔校军”之称。

一九二五年二月，“校军”奉命东征。东征是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其兵力及部署如下：

左翼军：粤军参加作战者约一万人，其任务是担任攻击河源、五华、兴宁一带。

右翼军：滇军第一、二、三军（缺第一师）约三万人，其任务是担任进攻淡水、平山（惠东）、海丰、陆丰一带。

攻城军：桂军全部约六千余人，任务是担任攻下惠州后，接应两翼。

及至二月一日，部队行将出发之际，复变更计划：以滇军为左翼军，由河源、老隆（龙川）以趋五华、兴宁，适当陈炯明部的林虎防地；粤军为右翼军，由淡水、海丰、陆丰以趋潮汕，而当陈炯明部洪兆麟之防地；仍以桂军担任围攻惠州之责。

当时黄埔军校只有第二期学生数百人，第三期学生刚刚入伍，加上教导第一、二两团，总计能作战者不过三千余人，初本不属于战斗序列，但军校系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为党军之基干，对于讨伐陈逆，负有很大的责任。孙先生对由军校训练的教导两团亦期望甚殷，故决定参加作战；又以当时粤军与本校较为接近，遂加入右翼军序列。

本校以教导团两团，第一期学生总队之步、炮、工、辎各队及第二期入伍生第一营编组为校军，由蒋介石统率，加入右翼军作战。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并负责指挥粤军（主要是第二师及第七旅）。教导第一、第二团之下级军官，均系本校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级军官分别由本校军事教官及第一期各学生队原有官长任之。两团团长系本校战术总教官或教授部主任，且均为教导两团之筹备组织者。故上自校长，下至士兵，精神一贯，同心同德，实为一组织坚强之团体。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校下动员令，定于二月三日在虎门附近集中完毕，相机动作。教导第一团（缺第一营）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前已开驻该地的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北栅、大怀德一带集中完毕，教导第二团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在白沙附近集中完毕。学生总队（步、工、辎）与炮兵第一营随同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中。校长、校党代表将后方及校务交由胡谦教育长负责。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留守，命副总队长张治中负责训练。校长、党代表等于是日上午八时亲率各队乘永福、福安两舰出发虎门太平圩，设校本部行营于方家祠。

二月四日上午九时，粤军王若周旅首先与在东莞之敌接触，敌不支而退。校军教导第二团与粤军的一个团包围敌西南方，协同进攻，午后四时攻下东莞。五日校本部行营移于东莞县公署，教导第一团及学生总队驻在城外警戒，第二团搜索敌之残余。

二月十日，教导第一团由常平圩向天堂围前进，击退平湖之敌。次日，学生总队及炮兵营随校本部行营移至平湖。是日正午，学生总队的步兵队进入深圳，敌望风而逃。十三日，校军进入龙岗，十四日拂晓进迫淡水城。

## 攻克淡水

当时据守淡水之敌为逆军熊略部千余人，翁辉腾部五、六百人，林烈部约五百人，还有其他小部共约有三千多人。淡水城虽小，却相当坚固，城濠既宽且深，地多开阔，接近甚难。淡水与惠州相距仅七十华里，惠州敌援军洪兆麟部可朝发夕至，若不即时攻克，势将腹背受敌。蒋介石遂决心于敌援军未到以前迅速攻下淡水，随即下令挑选奋勇队。教导第一、二两团奉到命令后，很快就挑选出奋勇官兵一百零五名，至校部领取攻城梯子七架，第一团担任攻击淡水东南端，第二团担任攻击淡水西南端。蒋介石并令右翼军粤军之第二师及第七旅，分别担任攻淡水东北及西南一带地区，以学生总队为总预备队。决定十五日拂晓为攻城时间，并规定一闻炮兵开始射击，即须准备完毕，俟炮击有效，敌势动摇时，立即乘机奋勇攀登，驱逐城上守兵，掩护部队登城，得手后即竖立党旗于城上。

二月十五日拂晓，教导第一、二团的奋勇攻城队挟梯攻城，蒋介石亲在洞井高地之炮兵阵地督战，各团营长均亲在第一线指挥。奋勇队在炮兵及步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之下，首先接近城根，城内敌人初尚极力顽抗，后见我军愈攻愈猛，继续奋勇前进，守兵胆破气馁，相继逃窜。教导第一团遂于晨七时首先登城，第二团继之，粤军亦乘势入城，守城之敌均被俘虏。淡水甫克，当日下午三时，敌之援军火至，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与校军教导第一、二团，与敌军激战于淡水城外东北一带平地，至傍晚敌始败退。此次淡水一役，黄埔军校成立的教导两团，训练时间很短，竟能一鼓攻克坚城，嗣又击退增援之敌，实由于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遂能克敌致果，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此次攻打淡水，队伍开到淡水西南角，离城只有六、七百米。我所在的第二团担任攻城任务，集中在一些小高地的后面，

敌人的枪弹不断地发射过来。由于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当时挑选奋勇队，我犹豫了一下，便被另一个人报了名，我没有参加，但经过这次战役后，胆子就壮起来了，在以后的多次战争中，胆子越来越大，一奉到攻击敌人的命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再也没有出现过情绪紧张的现象。

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发表告官兵书，主要内容有：1.嘉奖这次攻克淡水的英勇官兵；2.军官要为士兵表率；3.要绝对服从命令；4.要能忍耐坚持，争取最后胜利；5.要注意军风纪；6.部队无论住任何地点，都要严密戒备；7.部队驻地要挖粪坑，不要随地便溺。最后勉励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完全消灭敌人，誓不罢休，等等。

攻下淡水之后，第一团团长何应钦（他过去在贵州当过旅长，较有实战经验）马上派出警戒，严密监视敌人动静。而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却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只是通知各营连找个地方住下，他自己带着勤务兵找老百姓弄吃的去了。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第一团单独顶着，第二团的官兵在找不到团长的情况下，各营连都自动打了上去。那时，敌人把城外四、五华里的高地都占领了。我们第四连赶过去，马上展开，向山头上的敌人攻击。蒋介石赶来督战，站在我连后面不远的地方。过了一阵，王柏龄来了，蒋介石问他带来多少人？他说带来了一个连，蒋介石气愤地对他说：“我叫你当的是团长，不是当连长……”战斗在继续激烈地进行，随后粤军第七旅也赶来加入战斗，一同把增援的敌人打退了。

王柏龄和蒋介石在日本同过学，当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何应钦是他的关系介绍到黄埔来的。蒋介石为了严肃军纪，二月二十一日发布命令：免去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的职务，调校本部服务；升沈应时第二团团长（沈在淡水攻城时受伤，未到任前由钱大钧代理）；任命王俊为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刘尧宸为教导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系福建人，高个子，性格爽朗，

英勇善战，部属都尊敬他。此人后来任第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时牺牲了）。

孙总理在北京卧病，接到校军克复淡水之捷报，甚为欣慰，命汪精卫复电奖勉。电云：“接饒午淡水捷电，逐句禀告总理，不胜欣慰，并俞代电奖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的实行。汪兆铭贺。”

## 棉湖战役

二十日校军由淡水出发向平山（惠东）前进，遇敌洪兆麟之反攻部队于羊塘圩附近，经半天的激战，我军奋勇冲击，敌狼狈溃退。二十一日进驻白芒花。二十四日进驻白云市，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甚苦。二十五日进次平政圩。二十六日进驻赤石圩。二十七日向海丰进发。敌闻风遁走，我军猛追。沿途居民，壶浆欢迎，爆竹声喧，如庆升平。

这一段战争取得成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队英勇顽强，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于政治思想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当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校军政治部主任。战斗开始后，他随军出发，并参加作战。他经常派出宣传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宣传队到处贴标语，向老百姓宣传，对争取人民群众的了解与支持，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部队。他们对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每个士兵胸前所配符号的背面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的字样，由各连党代表常对士兵讲解这四句口号的意义。校军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不强占民房。这些纪律，在周恩来同志的坚持贯彻下，当时确实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一带出色的农运工作，也有效地支持了这次战争。记得在这次战役中，部队快要到海丰时，敌人跑了，这

时天也黑了，面前横着一条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河岸只有一两条木船，这样多人要过河缓慢得很。当时农民多方设法找来了十多条木船。晚上看不见，农民们用竹子捆成火把，用桐油点着，把两岸照耀得如同白昼，数千人的队伍很快就渡过去了，而且沿路居民烧好茶水，煮了番薯，摆在道路两旁。老百姓喊着：“弟兄们辛苦了，请喝茶，请吃番薯。”当时部队的纪律也确实很好，官兵们即使只喝一杯茶水或吃一个番薯，都要给老百姓留下几个铜板。

政治部每到一地，即使时间仓促，也要尽可能地召开军民联欢会，这对于民心士气都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二十八日进驻海丰城。三月二日进驻新田，三日进驻黄坑，四日进驻曲河，五日集中棉湖，六日到达揭阳（揭阳县城经洪兆麟部洗劫，全市荒凉，街头遍贴“被抢一空”、“被动数次”等标语），随即进入潮州。汕头由粤军主力进驻。

此次校军加入右翼军作战，自二月三日出发，于一月之间，连克各城，直抵潮汕，右翼之战争告一段落。但左翼之杨希闵与中路之刘震寰，同敌林虎等人早有密约，始终按兵不动，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其主力两万多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我右翼军后路，阴谋一举消灭我军于揭阳、潮汕之间。林虎乃陈炯明部之猛将，其力量亦远较他部优胜。此时，他亲率逆军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精兵两万多人，分数路如暴风急雨逼近棉湖向我进攻。

当时我军决定留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防守潮汕，留学生总队防守揭阳城，其余校军全部出击。根据派出的偵探报告，逆军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集中河婆（揭西）后，分两路来袭。三月十二日午后一时，敌军右路前队抵鲤湖，左路前队抵红湖（距棉湖五华里）。蒋介石率校本部到达普宁城后，即令第一团占领棉湖，第二团占领池尾，以抗右路鲤湖一股之敌。粤军许济旅（即第七旅）进至埔坑、狗埔等地（在棉湖之北），邀击

敌军。

此时林虎各军之位置如下：1.由上棚前进之一部，午后二时其先头抵红湖；2.和顺有敌军七、八千人，似有占领和顺北端高地之模样；3.鲤湖敌军约有五、六千人尚未前进，其后续部队尚有万人左右。总计两军之形势，林虎部的兵力与校军和粤军第七旅相较，以林军占绝对优势。而党军以疲战之余当新锐之众，其势尤相悬殊，所可恃者，常胜之师，余勇可贾，士气常壮，故敌虽众，不足畏也。

三月十三日零点三十分，蒋介石命令第七旅许济部于十三日晨七时半以前进至塔头埠向敌左翼包围攻击；命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于十三日晨五时三十分出发，攻击湖右岸鲤湖之敌，并掩护第一团之左翼；命何应钦团于十三日晨五时三十分渡河，攻击正面和顺之敌。

那时既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可资联络，又无骑兵可以传送，完全靠步行，所以上下间、友军间的联系十分困难，而敌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原已到达鲤湖之敌，仅留两千余人在鲤湖附近一带高地占领阵地，阻止我军攻击右侧，其主力军已转至和顺方面。又因无精细地图，许旅向敌左翼背迂回，越走越远，没有与敌接触的机会，反而使敌减轻了左翼的顾虑。这样，第一团遂独挡十倍多的大敌，成为有名的棉湖战役。

是日午前七时三十分，何应钦团长率部进至距和顺约四十华里之曾坑村，得知敌军王定华等部五、六千人已在和顺东端高地占领阵地。何应钦即以第一营、第三营为第一线，每营附重机枪两挺，第一营攻击正面之敌，第三营由右方前进绕攻敌之左翼，第二营及特种部队控置于第二线为预备队。但敌人既控制了有利的地形，人数复多至十余倍，接战之初，即以大部分兵力向我包围，彼此相距不过二百米。我第一营猛烈奋战，以白刃肉搏，反复冲锋，杀敌甚多，正面之敌，始不敢进，而我方损失亦十分严重。



敌人正面难以进取，遂以强大兵力向我左翼袭来。何应钦立即命令第三营迅速攻击前进，占领右前方最高地以压迫敌人，并令预备队派出一连掩护重机枪挺进，与敌激战而牵制之。午前十时因第一营左翼向曾坑村东北之小高地转移，于是曾坑村已无兵据守，敌人遂由曾坑村前进至该村东端田地内，距团部仅二百多米。何乃命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预备队的第六连渡小河用刺刀向敌人猛冲，同时命炮兵向曾坑村东面田地内之敌人射击，命中数炮，敌争向后退。我炮兵继续向曾坑村内射击，毙敌二十余人。这时我军跑步追击，敌军被迫退出曾坑村，我第二营第六连占领后据守之。到十一时三十分，敌复增兵反攻，该村东南方田地内发现敌军数百名，对第二营之五、六两连进行猛烈攻击。何应钦复命仅存之预备队第四连加入战斗，增加左翼攻击敌之右侧，并亲自率领团部之特务连（即警卫连）和团部人员，督兵奋战，往来冲杀，敌虽顽强，死伤甚重，乃纷纷向上北溃退却。

此役，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众，独当新锐二万多之敌，将士用命，前仆后继，牺牲惨烈。自晨至午，我军已苦战半日，仰视天空，日仅当午，右翼许旅已否到达战场尚无消息，鲤湖方面的教导第二团亦没有联络上，总预备队已使用无余，而敌人兵力雄厚，有增无已，下午半日的战况正不知如何结果。当此情况十分险恶之际，前派出的侦察班适赶回团部报告，称粤军许旅由右翼前进，先头部队已与敌人接触。何闻许旅已到，右翼可无顾虑，第三营与敌激战半日，伤亡甚大，迨许旅到达，遂协令向敌攻击。敌人见我右翼已增加生力军，遂以大部分兵力猛向我左翼包抄，第二营陷入十分苦战中，飞请派兵增援。何应钦乃令团部的特务连残部参加战斗，迅即增援左翼，自下午零时三十分起，会同第二营猛烈冲杀，白刃相接，喊声震天，虽给敌人以创伤，挫其凶焰，但敌恃其人众，仍继续顽抗，战斗激烈达于顶点。此时，第一团已无兵力可以增援，乃命仅存兵力固守几个高地。午后一时以后，右翼许旅及第三营方面战斗渐趋激烈，经我猛烈冲

击，敌不支纷纷向和顺方面溃逃，敌之左翼渐趋崩溃。许旅及第三营跟踪追击。同时在中央之第一营亦自阵地兴起，向和顺方面前进，与右翼协同出击，追奔逐北，所向无前。不料进至和顺村附近，村内尚有大量敌人，竟然施行猛烈反攻，并用机关枪向我猛烈射击，许旅一部退却，教导第一团之一、二两营死伤枕藉。处此千钧一发之际，何应钦亲率左右二、三十人和尚控制在手的重机关枪一挺，对敌人实行最猛烈之射击，并大声呼喊，杀声震天。敌人惊惧，徘徊瞻顾，踌躇而不敢进。

棉湖之战，打得十分激烈，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现在来谈谈第二团的情况。我那时在第二团第四连当排长。我们向鲤湖出发，大约晨八点到达鲤湖附近，此时已能听到右翼的枪声和炮声。钱大钧团长估计我第一团和敌人打起来了。我们前面，靠近左边是高山，正面是一个二百米高的高地和一片开阔的稻田。钱大钧召集营长开会，决定立即攻击，迅速击破正面的敌人。刘营长当即召集排以上的干部开会，宣布第二营的任务是担任正面攻击，四、五两连是第一线，六连为预备队。我所带领的第一排投入战斗后立即散开，冒着纷飞的枪弹、炮弹，强行通过一片三、四百米的开阔地，大家拼命往前冲。好在敌人既没有轻重机关枪，步枪的命中率又不高，因此当我们冲过这段开阔地时，仅仅伤亡了几个人，其余都顺利地到达了山底下。连长命令上刺刀，大家一同喊着杀声，不到山顶敌人就跑了。左翼高山是三营去攻击的，也把敌人打退了。到了下午两点多钟，东西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我们便立即去支援第一团，攻打敌人的侧面，终于和一团一起把整个敌人打垮了。

是役最激烈之际，蒋介石、廖仲恺党代表和加伦将军均亲赴前线督战，校军士气激昂，均有以一当百之精神。

棉湖之战，虽云苦战，牺牲甚大（全团九个步兵连长，阵亡了六个，伤了三个，副连长、排长伤亡甚多，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但能于一朝之间将数年来背叛孙总理、盘踞东江

之逆军歼灭殆尽，不负孙总理创办本校、培植党军之初心，亦一大快事。惜乎孙总理已于前一天逝世于北京，不及闻此重大捷报也。

三月十四日校军追击残敌，向河婆前进，又将败敌黎生部击溃。十五日午后五时集合训话。蒋介石、廖党代表、加伦将军都讲了话，其要点如下：

蒋介石说：敌人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由于我们信仰总理的主义，有主义而奋斗和牺牲的决心，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切记不要骄傲，今后要打的仗还很多。

廖党代表说：我赶来是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来慰劳你们，犒赏你们的，正好碰上这次棉湖大捷。总理过去曾经想把学校培养成革命军，你们真正当得起这个称号。他着实奖勉了部队一番。同时代表中央委员会奖励给每个团一千块钱。

加伦将军的讲话要点：他称赞这次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很少的。他说，我们以为俄国十月革命时，处境非常困难，作战非常英勇，但也很少有可以和这次棉湖战役相比美的。他特别着重讲了第一团的战斗，说：当时何团长要是动摇、犹豫，战局将不可收拾。说完当场解下身上的佩剑，赠送给何团长。

大家都很激动。这次讲话是在一沙滩上进行的。

廖党代表由潮汕回广州后，四月初曾到黄埔对在校学生讲话，特别讲述了棉湖战役的恶战苦斗，以及加伦将军解佩剑赠何应钦一事。

## 清 扫 残 敌

五华、兴宁为林虎之巢穴，陈逆炯明之根据地，自党军占领潮汕之后，林即将全部兵力开回，以固其巢穴，并用全力以袭党军之后而谋复潮汕，自前日棉湖和顺之战为党军所败，溃兵仍向五华、兴宁退却，林虎亲自收集余部，部署防务，以图固守，而

作背城借一之举。

棉湖会战及河婆战斗后，蒋介石与加伦将军策定，命新从广州开来的粤军吴铁城旅向兴宁前进，命校军及许济旅向五华前进。十六日晨我军自河婆出发，经过甘坝，有乡民壮丁九十余人自愿随同校军作战，校本部嘉许之，并予以优待。十七日行抵周江圩，使得由安流退却之敌，其主力经锡坑、锡坪退往五华。蒋介石遂决心要于十八日占领五华城，命教导第一团于十八日晨五时出发，经龙都、锡坪、高竹园、西林坝等地向五华前进，校本部及教二团于晨六时出发，跟第一团前进，第七旅在后跟进。他规定占领五华后之警戒归教一团担任，另派部队占领电报局，首先收集来电和检查已发电稿，切断老隆、兴宁间之电报线，并派部队占领县府，到各单位搜集军用物品，占领邮局，检查邮件，以及搜集可作情报之资料。十八日午前由周江圩出发的教一团，经锡坪向五华搜索前进，走了约一百里，至午后六时抵达离五华城四华里之五口塘西方，得知五华城内外之敌约有千余人，系王得庆由老隆带来之部队数百人及从河婆逃回来的数百人。敌人不料我行军迅速，未派警戒部队。我获得以上情报后，天已黑暗，何应钦欲使敌人完全缴械，遂采取包围形势，分兵围击，至晚九时布置完毕，敌尚未知。我军前卫部队假称敌军，赚开城门，将步哨缴械捕获，用之为向导，将城内敌人一网打尽，并捉得王得庆部的参谋长及林虎部的副官、参谋多人，械弹、輜重亦颇多。

攻下五华后，教一团留守，教二团继续向兴宁前进。十九日一大早，队伍向兴宁前进。第二团的第四连是尖兵连，我所带的第一排是尖兵排，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五华离兴宁只有三十华里，我带着一排士兵一路上搜索前进，快到兴宁，找到了向导。在前进中，遇到一条河，河中有些船，有几个敌兵还在弄东西吃，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出其不意，一下子就抓到他们两个人，其余的几个跑脱了。这几个兵跑到城里大声嚷嚷说：“敌人

来了！敌人来了！”然后把城门关闭起来。兴宁南门有一条小街，我们想跟着进去，敌人便在城墙上往下打枪，我们只好就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这时林虎本人就在兴宁，兴宁是他的老巢，凡是退却的队伍都进入兴宁。从河婆向北走，有两条路，一条通向五华，一条通向兴宁。当时在河婆，除我军外，还有刚从广州来的粤军吴铁城旅，蒋介石令其率部尾随敌后向兴宁前进。我们走小路。

林虎准备固守兴宁，背城一战。攻击战开始的头一天，没有打下来。第二天继续强攻，吴铁城部已到城外，在我们的右翼。城外有山叫神光山，和敌人形成对峙的局面。我二营从南门猛攻时，我营营长刘尧宸受伤。奉团长命令，二营暂时不参与进攻，只占领阵地，与敌人对峙。第二天继续攻打兴宁的西南角，粤军也一并攻城，但没有登上城，最后还是我们教导第二团第四连从南门攻进去的。兴宁南门有一小街，晚上可以摸到房顶上，逐步接近敌人，顺着梯子往下滑，因此第二天就把城攻下来了。四连和九连都攻上城头。敌人惊惶失措，一边大呼“学生军进城了”，一边从东门逃窜。没来得及跑的都被我们俘虏了。林虎仅以身免。兴宁遂被占领。

当我军进攻兴宁时，粤军第二师主力由潮汕沿韩江北进，攻克梅县、大埔以达蕉岭。

在这次战役中曾发生了桂永清贪污事件。攻打兴宁时，桂永清是九连连长，进城之后，乘林虎部仓忙逃窜之际，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可能还搞了些钱）。第二天桂把这些东西包好，送到邮局去寄。我军一攻进城就去控制敌军司令部的文电室和地方上的邮电局，进行信件、电报等的检查。邮电局负责检查的人，发现桂永清寄了好几个包裹，都是抢来的，于是截下包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十分恼怒，下命令立即枪毙桂永清，并通令全军想借以整肃军纪，教育部队。正要执行时，恰逢廖党代表到来，此时廖已知道孙总理在北京病逝，怕影响士气，一路上都不

曾透露，这时即以孙总理刚刚逝世为理由，一再商请蒋介石不要枪毙桂永清。碍于廖的面子，最后只给桂以撤职处分，桂的性命才被保留下来。

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孙总理逝世的消息，并在兴宁集中所有部队举行追悼大会。大会是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布置的，蒋介石、廖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在会上都讲了话，意思都是要继承总理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其间，蒋介石派蒋先云等人在林虎的司令部专门检查了文件和电报，得到了他们同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秘密通电的情报，才知道杨、刘按兵不动的原因，也是以后要回师打杨、刘的原因。

校军自东征以来，所向披靡，敌胆早寒，陈炯明于二月二十六日由汕尾逃往香港。趁校军克复兴宁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潮汕久为逆军所盘踞，政治方面亟宜整顿，以苏民困，乃任命蒋介石兼任潮汕善后督办。三十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兼任校军指挥官。蒋应许崇智之邀，由兴宁赴汕头。四月一日蒋偕加伦将军抵汕头，与许崇智会商潮汕善后事宜。三日离汕头返黄埔本校，七日任命王懋功为潮汕校本部行营主任。十一日校军全部由兴宁移驻梅县，于是第一次东征战争遂告结束。

校军东征，战绩辉煌。四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本校教导团成立党军，并训令云：“查本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廖党代表仲恺提议，请以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二两团成立党军第一旅。任命何应钦为第一旅旅长，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全旅仍归蒋校长中正节制调遣，此令。”随后又在广州成立教导第三团。那时沈应时伤已痊愈，接任第二团团长，钱大钧为第三团团长。以后党军第一旅改为党军第一师，第三团收入第一师建制。

兴宁战役结束后，我连连长王声聪奉令调升为本校入伍生团少校连长，由蒋先云接任第四连连长，我由少尉升为中尉排长，不久又调为副连长。

## 回 师 广 州

杨希闵所辖的滇军和刘震寰所辖的桂军，本是地方军阀，既无爱国思想，更谈不上参加革命。一九二三年，他们假追随孙中山先生于革命的美名，会同粤军许崇智部攻打陈炯明。当陈逆退出广州窜据东江后，杨、刘就窃据广州及附近各地，把持财政，扩充个人势力，胡作非为，不听孙中山的调遣。一九二五年春东征时，统率左翼军的是滇军的杨希闵，统率中路军的是桂军的刘震寰。但当右翼军攻击前进时，杨、刘却是按兵不动，并与林虎密约，唆使其邀击我军后路。林虎部主力原驻兴宁、五华一带，以有力的一部驻守河源、紫金、老隆等地，防滇军之进攻。由于有了这一密约，林虎便得以集中其所有兵力约两三万人浩浩荡荡向东急进，企图一举消灭我右翼军（特别是校军）于揭阳、普宁地区，致有棉湖之役的恶战。

迨我军将林部主力击溃，东江肃清，杨、刘遂益不自安，乃又派密使与北洋军阀勾结，公然反对由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政府，阴谋夺取广东全省政权，致使革命政府处境十分艰危。

先是，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春自上海回到广州，设大本营于珠江南岸的“土敏土厂”，当时尚未修建桥梁，两岸交通全恃船舶。南岸驻军为粤军的李福林部，是忠于孙中山的。但该部仅有三、四千人，武器亦不充足。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及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希闵、刘震寰等遂更为骄横，截扣所有税款，全入私囊，使李福林军及黄埔军校常濒于伙食都难于维持的境地。胡汉民以代大元帅名义严肃谴责滇桂军的这种行为，要求杨希闵、刘震寰严加约束。杨希闵自恃其兵力强大，根本不把胡汉民看在眼里，竟回答说：“请代帅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其狂妄竟至如此。在杨、刘反革命阴谋暴露后，广州市各机关纷纷迁往河南，市区成为滇桂反革命军

阔耀武扬威的地方。市区街道到处都是滇桂军人，对商民货物任意拿取，不给钱或少给钱，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使全市居民恨入之骨。

滇桂军公开背叛后，当然企图消灭南岸的李福林军，尤其十分嫉恨黄埔军校的存在。我方亦严密戒备，到处构筑工事，在南岸各重要交通口，堆集沙包，架设重机枪，对船舶实行管制，士兵昼夜巡逻，严防敌军偷渡。在黄埔岛上，更是以缜密的计划，分区布防，积极修建工事。白天除部分担任警戒外，其余加紧训练射击、投掷手榴弹等作战技能，夜间则戒备森严，防备敌军的袭击，使杨、刘二逆无隙可乘，以待党军之回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廖仲恺党代表来到汕头，会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当晚在粤军总部开会，由许崇智（粤军总司令）主持会议，蒋介石、廖仲恺、朱培德等人参加，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列席。会商结果，决定暂时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障碍革命的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当时策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大纲如下：

方针：将主力作战诱导于东江方面的石滩附近，寻求敌之主力而击破之；命令驻在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同时包围，以达完全歼灭敌军的目的。

指导大纲：第一期作战，以东路军——即党军和粤军的第二师、第四师（该师系以原粤军第七旅许济部扩编的），由潮汕方面西进，先将驻守在东江之敌军击破之。俟两军会战正酣之际，令黄埔军校的学生及教导第三团相机出击，将敌军向西压迫。第二期作战，命北江军（即驻在韶关一带的湘军等部队）南下，将新街敌军击破后，以一部南追广州，以主力绕至东江，夹击东江敌军。同时命西江军（即李济深的粤军第一师，原驻肇庆一带）东进，直迫省城，以收包围之效果。在河南的粤军李福林部担任地方的警备，并防阻敌军南窜。

杨、刘使悉我军将回师讨伐后，乃将滇桂军主力集中广州，



并强征民夫，在广州及郊区挖掘工事，企图作顽强的抵抗。我方乃任命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率粤军、党军克日回省讨逆；同时允许被击溃的陈炯明残部（主要是洪兆麟、林虎等）投诚，准许他们回驻潮梅一带。我则留粤军第二师之一部在汕头及沿海几个城市监视之。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率党军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粤军第四师（由第七旅扩充的）许济部、警卫军吴铁城旅（由欧阳驹指挥，吴本人未来），分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由潮梅地区出发，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当时党军第一旅驻在梅县及其附近，由于军队纪律严明，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军民之间感情十分融洽。老百姓及学生们听说我们要走，十分难过。在我们出发时，许多人都自动来送行，招手告别，依依不舍。在回师的路上，老百姓仍然是热情接待。孙中山先生曾设想要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第一步使武力和人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当时的党军确是做到了第一步。

党军第一旅基本上是沿着原来的路线回师的。行至海丰附近，我连连长蒋先云奉命调总指挥部担任蒋介石的少校侍从参谋，由我升任第四连连长。那时我刚满十八岁，真是年幼无知，竟然充当“百人之长”，实在有些诚惶诚恐。

六月九日前后，蒋介石率党军、粤军回抵石龙附近，也就是到达了攻击准备的位置。时滇桂军并无充分的作战准备，且其第三军军长胡恩舜、第二师师长廖行超各欲扩张势力，暗与革命政府方面通款，不听杨、刘之指挥。杨希闵几次召集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由于各怀鬼胎，难以作出正式决定。及至党军、粤军已经逼近，乃始谋抵抗，仓促应战，集中其主力部队于广州之东郊，设重兵于龙眼洞、瘦狗岭及广九路一带，以图背城借一。蒋介石先令党军向占据石滩车站一带的敌军发动进攻。敌军力图抵抗，经党军奋勇进击，仅激战数小时，该敌即向增城退却，党军当日即占领石滩。当时蒋介石得到情报，获悉原驻惠州

之滇军正向广州运动，增援逆军，即令粤军第四师绕道迎击之。在此同时，我军主力直趋龙眼洞、瘦狗岭附近，又以一小部沿广九路前进，一则牵制广州方面之敌，一与黄埔本校学生总队联络。

为了一鼓歼灭杨、刘两逆所部，我方在北江之湘军谭延闿部与建国军朱培德部，由粤汉路南下，粤军的李福林部由河南隔珠江进攻广州市，西江之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抽调一部沿广三路东进以攻广州。廖党代表并派人密与铁路、电船工人等联络，及时乘机乔装避匿，使得滇桂军的调遣运输，莫展一筹。

六月十二日，我各部队进攻龙眼洞，党军第一旅担任右翼，粤军第一旅担任左翼，警卫军吴铁城旅为总预备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即将龙眼洞占领。至此紧缩了对滇桂叛军的包围圈。当时滇桂军号称有四、五万人，均麇集在广州附近，除以一部防守我珠江南岸部队的进攻，以一部阻止由北江南下的湘军外，大部分据守广九路车站、瘦狗岭及白云山一带，而以瘦狗岭为阵地的轴心。我军攻占龙眼洞后，士气十分旺盛，无不思一鼓作气灭此朝食。总指挥部乃下令各部队于十三日拂晓发起总攻。党军第一旅奉命担任攻击瘦狗岭，第一团在左，第二团在右。我营在刘尧宸营长的率领下，于黎明时即开始从山麓进攻，夺取了敌军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扫除了敌军设置的层层障碍。我党军第一、二团攻势凌厉，人人奋勇争先，战至十一时左右，即完全占领了瘦狗岭南北之线，毙伤敌军千余人，俘虏约三千人。滇军各级军官无不嗜好鸦片烟，士兵亦颇多抽吸，所以滇军当时每人有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我军攻占瘦狗岭时，无论是山背面或山沟里，都可嗅到鸦片烟的气味。

在此同时，黄埔军校学生队的野炮与海军的大炮亦向广九路一带轰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借炮火之掩护，乘机由猎德村渡江进攻广九路。激战数小时，敌军师长赵成梁被我炮火击毙于广九路车站，敌军阵地动摇，学生队乘势攻占了广九车站一带。入伍

生学生总队第一队少校队长王声聪在渡江攻击时，亲持手枪立于船头，行将登陆之际，被敌军击中，英勇牺牲。他是我当学生时的区队长，在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排长时的连长，为人沉着勇敢，待人谦和诚挚。他和我共事一年多，深得其益，闻其战死，不胜伤感。

当党军及学生总队攻占瘦狗岭、广九车站等地时，粤军亦奋勇攻占白云山之敌，于正午前占领之。至此，敌军全线崩溃，死亡枕藉，残部纷纷向广州市溃退。由于滇桂两部逆军，平时纪律很坏，盘踞市区两年，胡作非为，恣意掠夺，居民早已恨之入骨。闻其败也，市民奋起，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

我军进入市区时，几乎到处都有逆军尸体。逆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及部分将校级军官，多逃匿沙面租界内，借英帝国主义的掩护，随即逃往香港。溃退的官兵退至广州市西区的兵工厂附近时，适湘军及建国第一军（朱培德部）亦已进至该处，遂尽将敌人缴械。号称有四、五万人的滇桂军，把持广州两年之久，一与党军及其他拥护革命的部队接触，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完全崩溃。

当我军于六月九日攻占石滩车站一带时，敌军胡思舜残部向增城方面退去，约有三、四千人，我总指挥部以为是小股兵力不足为患，遂忽略了派兵追击或监视之。及至我军扫荡了广州市区的敌人后，党军第一旅之一、二两团均住在北校场营房里。六月十五日，部队休息，官兵多有在小河边洗衣服者，不料败退增城的胡思舜部，竟于十五日上午九时左右突然占领北校场营房附近一带小高地，向营房内猛烈射击。这是对党军的一次严峻考验。如果我军秩序混乱，乱奔乱跑，不仅有损党军的荣誉，而且有使广州得而复失之虞。但是党军的每一官兵，都懂得自己的责任和荣誉，决不能在敌人袭击之下溃散，每个人都自动拿起了武器，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个连或排，在连长或排长指挥下，跑步

越过一段开阔的山野，向着占领一些小山头的敌军猛打猛冲，杀声震天。随后，营长、团长等都紧赶着上来了，士气益旺。敌军本是乌合之众、惊弓之鸟，见党军如此英勇，立即向北和东北方向溃逃。我军猛追，或抄截敌人退路，自上午九时起战到下午两点多钟，终将这股敌人完全消灭。

回师广州，削平杨、刘，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对以后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役结束后，党军第一旅改称为党军第一师，原由钱大钧成立的第三团归入第一师建制。

## 成立国民政府

讨平杨刘、统一广东后，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多次商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改组广东军政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汪兆铭、徐谦、张继、谭延闿、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戴传贤、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为委员，选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委。由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

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朱培德、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负责整编和节制当时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所有部队。

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下令取消“粤军”、“湘军”等名称，所有部队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一律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部制度。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改组广东省政府，力图统一广东的

民政、财政，提出严惩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统一税收等口号和方针；在军事方面，则采取整编旧军队、严肃军纪等措施。这样就必然触及广东的一些旧官吏和旧军官们的利益，遂又形成另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

## 沙基惨案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有两种手段：一为直接出兵，强占我领土，残杀我同胞，强迫历届卖国政府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让领土，开辟租界，开采矿山，修筑铁路，创办工厂，夺取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一为勾结我国军阀，利用买办阶级，贩卖军火、毒品等，以制造内乱，弄得国内连年内战，他们利用机会，大发横财，吮吸我国人民膏血……总之，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时为止，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和对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全国人民日益觉醒，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号召，深入人心，这是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最为嫉恨、最为恐惧的，必欲以破坏之、摧残之而后快。沙基惨案的远因在此。而其近因，则是由于“五卅惨案”的发生。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旬，继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后，日商内外棉第十二厂再次进行罢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第七厂，并开枪杀害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市学生为顾正红案举行示威游行，在南京路为英租界巡捕开枪射击，死伤多人，遂演成上海南京路之大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愤激万分，各地响应支援者相继而起，广州就是以援助此运动而演成沙基惨案的。

广州市珠江南岸有一块地叫沙面，过去被英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朝卖国政府辟为租界，受英国人统治，并驻有少数军队。“五

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各界即行组织“各界对外协会”，努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于六月二十三日示威游行以为声援。是日上午十一时各界群众（包括工、农、学、商、军）有组织地向东校场集合，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八百多人，党军第一团第三营全部，第二团第二连、第四连（我当时是第四连连长）、第七连共约二千人前往参加。总计人数约有七、八万人，以学生为最多。集合完毕时，各界公推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为总领队。依工、农、商、学、军的次序由东校场出发，每人手执一面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的小旗帜，四人为一列，整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帝、反封建的各种口号，声音响彻云霄，士气激昂。当经由长堤西进时，队首工人、学生将次过沙基入内界时，沙面租界的外国人及其武装队伍忽躲入于事前构置的沙包后面。当我武装部队将进入调元街口附近时，沙面维多利亚酒店楼上突有外国人开枪射击，同时英国工部局及屈臣氏药房（在沙面西门口内）附近洋楼内，机关枪声大起，向游行队伍猛烈射击，沙包内之排枪同时并发，河面上的英、法、葡各国兵舰亦发炮轰击，一时枪炮之声震动全市、惨不忍睹。我武装部队立即散开卧倒，向沙面之敌还击，许多楼房的玻璃门窗等被我打得粉碎，我们全力向据守在沙包内的敌人射击，藉以压制它的火力，同时我们派人掩护徒手群众避难。当敌人向我武装队伍用机关枪扫射时，我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第二团第二连排长陈纲、李道明，入伍生第十连排长文超代均被当场击毙，士兵及入伍生死难者二十三人，受伤者五十三人；其他群众，死者百余人，伤者三、四百人，血肉横飞的惨状，实数倍于上海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凶残，暴露无遗。

我连在第二连之后行进，我与第二连的陈排长相距仅十步左右。一闻枪声，我立即大声叫大家卧倒，减少目标。广州的街道下面一层都是每隔五、六步就有一个石柱，我又命士兵逐步退到

石柱后隐蔽并继续向敌射击，故我连仅有三、四人受伤，没有死者。

到下午五时左右，游行群众疏散完毕后，何总领队乃下令我们武装部队停止射击，旋即整队回营房。

沙基惨案发生后，我广东省政府立即对英、法、葡三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向日本、美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丹麦、智利各国发出照会，说明惨案情形，……游行时和平肃穆，绝无可以引起误会之处，不料于午后三时十分行经沙面对岸之沙基一带时，突有沙面外国兵警发枪向游行群众射击，继以机枪扫射，又继以外国兵舰之大炮轰击，事起仓猝，路狭人稠，以致死伤枕藉，现时所知道的，游行群众死伤人数达四、五百人，其中有幼童及女学生，路人为流弹所毙伤及被挤落水者亦颇多，尚在清查中。

广东省政府对英、法、葡三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而法国领事为先发制人之计，竟于当日晚即致函省长公署，不顾公理，捏造事实，诬我向他们开枪，要求赔偿损失，保护外侨生命。英、葡两国领事亦于六月二十四日致复牒于省政府公署，葡领事不承认开炮，妄图抵赖。英领事则反诬我游行群众先行开枪，对此惨案推卸责任，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继续提出第二次抗议，因未得圆满答复，乃更提出第三次严重抗议，仍无相当结果，因而我在香港的工人完全罢工，全市民众实行经济绝交，以谋抵抗，同时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积极支持香港工人的爱国行动，此一斗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

为纪念先烈与策励后死者，于沙基惨案之第一周年纪念日（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建立沙基惨案纪念碑，上刻“毋忘此日”四个大字，以志不忘，而坚卧薪尝胆复仇雪耻之志。

## 廖仲恺被刺始末

当党军回师讨伐杨、刘之际，预料到陈炯明残部必然乘机复据东江，为一时策略计，允许林虎、洪兆麟等投诚，回驻潮梅一带（原留在汕头等地粤军第二师的部分队伍，随后也相继撤回）。当时广东一般政客及野心军官，目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感到自身有被革命势力冲刷的危险，乃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相聚密谋推翻革命政府。他们以拥护许崇智（许那时是粤军总司令）为名，与香港的英帝国主义相勾结（英方许以二百万元助其为乱），积极准备进行暗杀和暴动。

这里，顺便说一说许崇智这个人。许是广东人，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加入过同盟会，在一个时期里表现得颇有作为，为孙中山所器重，得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说：

“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孙先生这段话里就包括许崇智所率之粤军在内。事实上，许崇智自回到广州后，日渐骄横，沉溺声色，在其所霸占的地区内，截留税收，贩卖鸦片，大开赌馆，多方聚敛以自肥。当时在广东的一般政客、军官等均趋炎附势，奔走于许氏之门。当孙中山锐意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许崇智不是一个积极的拥护者，而是各种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在另一方面，廖仲恺先生及其夫人何香凝则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最得力的战友。一九二三年春，孙先生重返广州，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进行革



命，以及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等措施，拥护最力、工作最力的首推廖仲恺先生。当黄埔军校创办时，仿效俄国十月革命时的红军制度，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孙先生即指派廖仲恺担任军校的党代表。当时军校经费十分困难，常常有断炊之虞，如没有廖党代表的多方设法，竭力支持，军校几乎无法继续办下去。廖常到各学生队视察，问寒问暖，极为学生们所爱戴，称之为“军校之母”。廖真诚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支持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及各行业的工会等。党军回师广州消灭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叛军后，廖仲恺除仍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外，并以一身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诸职，劳心焦思，废寝忘餐，力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力谋黄埔军校的发展与扩充。而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其所为不利于己，遂萌谋杀之念，此廖党代表被刺的主要原因。

当党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部失败后，其残部退据闽粤边境，伺机卷土重来。那时一般广东野心军人及官僚，如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梁士诤、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招桂章、杨锦龙、赵士觐、谭启秀、郭敏卿、莫雄等，以封建思想为主导，阴谋盘踞广东的地盘，乃利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从事种种反动活动。当党军刚刚离开潮汕梅县等地回师广州之际，魏邦平、张国桢、杨坤如等人即赴汕头见许崇智，陈述拥戴之意，并议定条件：1. 由魏邦平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许；2. 由张国桢联络叶举、洪兆麟、林虎、熊略等部一致拥许。同时彼等又与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勾结，由英方在金钱和物资方面给予帮助。及杨、刘平定之后，革命政府的基础益形巩固，党军的势力亦渐扩充，更使彼等自怀不安，谋乱益急。魏邦平、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等，连日密谋，策定首先刺杀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三人。至八月初间，此种传说颇盛。当时有人曾劝廖党代表加以防范，廖仲恺说：“我们天天与群众接近，如何防范得许多。

听他们来便了。”至八月十九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后，廖仲恺曾对汪精卫戏言曰：“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孰知此语，不幸而中，廖党代表竟于翌日为奸人所杀害。

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许，廖党代表赴中央党部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甫抵门首，突被凶徒六、七人乱枪狙击，身受数伤，弹贯胸膈，急送至医院抢救，卒因弹中要害，创重殒命。当时有一凶徒叫陈顺的，被廖党代表的警卫兵打伤，当场捉获，且搜出手枪及证据多种。于是谋杀内幕始稍有端绪，并查得手枪系朱卓文常用之物，所使用的子弹果系手提机关枪子弹。

廖党代表被刺之当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一重大事件，对政治、军事、警察等得全权处理。当晚三人在粤军总司令部商议应付时局方法。时梁鸿楷在室外对吴铁城（梁鸿楷是粤军的一个军长，所部大多驻在广州及附近。吴铁城那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说：“现在政府派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公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之所以被害，完全是因为他主张共产。朱卓文如果是为反对共产而打死廖仲恺的，怕什么不敢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告诉特别委员会三公，此案还是放松一点的好。”吴铁城当即将梁鸿楷讲的话向特别委员会报告。因而推断此案并非简单，牵连甚广。二十二日复得密报，胡毅生等连晚在魏邦平家开会。二十三日又得李福林（为粤军的一股，驻珠江南岸一带）报告，说胡毅生对他说，党军已由粤汉路开向河南（即广州市珠江之南）攻打福军，希预为准备，免遭消灭等语。又据李福林说：“在八月初间，我亲闻朱卓文、林直勉等公开声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特别委员会根据以上各种报告，即于八月二十四日下令捕拿胡毅生、林直勉等。林直勉被捕后，供出彼等受香港英帝国主义方面的金钱帮助，参与刺杀廖、汪、蒋等人的阴

谋。二十五日又捕获梁鸿楷、张国楨、杨锦龙、梁士锋、谭启秀、郭敏卿等一般广东旧军官，押送到黄埔岛上关押。张国楨被捕后曾向许崇智报告说，他对此案早已知晓，两星期前梁鸿楷、魏邦平、杨锦龙、梁士锋等，曾在张的家里开过几次秘密会议，策划推翻国民政府，暗杀廖、汪、蒋三人，捕杀共产党人。至此，本案真相大白。但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要犯，均逃脱法网。

梁鸿楷部约有一万多人，分驻在广州市内及市郊一带。蒋介石那时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他得知梁鸿楷是刺杀廖党代表主要凶犯之一，遂决心解决梁部。八月二十四日傍晚，蒋介石来到北校场党军第一师司令部（那时一、二、三团都驻在北校场附近），要何应钦立即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人到齐后，蒋介石向大家说明了廖案的重要情况，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调查表，系梁鸿楷部队连以上的驻地，命令党军第一师务于当晚采取行动，限于二十五日拂晓前将梁部全部缴械。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指示，详细地规定了各团的任务、出发的时间、行动的机密等。

那时我在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八点半钟左右被召到团部开会，由团长沈应时说明情况，即分配各营任务。我记得第二营是负责解决驻在东山附近（那时的东山还算是市郊）梁部的一个营。我受命后回连只告诉副连长和各排长，同时命司务长务必在晚上三时前把早饭做好。及到三点多钟全连吃完了早饭，即全副武装集合去到营部。营长刘尧宸（他在第一次东征受伤痊愈后仍回原职，不久即调升为第四团团长）亲率第四、第五两连向东山附近的一个庙宇行进，严格规定不得点火，不得有响声，队伍必须紧紧跟着，不得有掉队的。我们部队在黑夜里秘密运动，天将破晓前就把敌军的一个营团团围住。当天色有点微亮时，我们就命令该营官兵一律不准起床，将武器弹药全部收缴，随即将俘虏、武器等带回北校场营房。事后了解到，各部队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响一枪，就把梁鸿楷部解决了。

许崇智本是蒋介石的上司（蒋那时仍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

长)，廖案发生及被揭露，这些要犯多是许的心腹，尤以未经许的同意就解决梁鸿楷部，这当然使许难堪和感到愤怒。这样，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记得梁鸿楷部解决后，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书，要求许崇智暂离广州，信颇长，语多贬斥，原文记不得，记得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1. 廖案发生，阴谋毕露，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祸。2. 收编不少旧军队，名称繁多，毫无整顿计划，致令奸人逞虐。3. 控制各地的收入月达一百万元以上，而部队缺食少衣，几个月不发饷，官兵怨愤。大宗款项用于何所？日事聚敛，将欲何为？4. 霸占中央银行，囊括全部税收，不给各军。最后蒋介石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免得阻碍革命的进展，成为先总理（指孙中山）的罪人，等等。许崇智得蒋介石信后，便于第二天离广州去香港。

廖案发生，胡汉民之弟胡毅生是要犯。胡汉民为避免嫌疑，请求辞职，随即离开广州。

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驻在广州的梁鸿楷部后，不久又派兵解决驻在东莞、宝安等地的粤军。他将这些缴了械的士兵和部分下级干部进行整编，改称为党军第三师（没有多久，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派谭曙卿为第三师师长，以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八团团长，卫立煌为第九团团长。他还从军校和第一师抽调了大批干部去第三师担任各项军职，并指令该师驻石滩、石牌、新塘等地整编训练。

自回师广州消灭杨、刘后，蒋介石即先后成立了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随即以这三个团编为党军第二师，派王懋功担任第二师师长。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黄埔岛上成立教导第一团起，到一九二五年九月，仅十个月便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师，辖九个团，还有炮兵，工兵，通讯等营。黄埔军校陆续招生，这时已有三千

多人，大部分为第四期入伍生。此外还办有航空训练班，购进了十来架飞机（多为教练机）。发展之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现将当时第一军的主要负责人记述于下：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副军长何应钦。周恩来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

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刘峙，团党代表贺衷寒。第二团团长沈应时，团党代表金佛庄（共产党员）。没有几天，沈应时调升为第三师副师长，团长由金佛庄接充，团党代表为倪弼。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团党代表包惠僧。

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师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记不得了。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刘在惠州战役阵亡后，由惠东升升充团长），团党代表徐坚。第五团团长蒋鼎文，团党代表严凤仪（共产党员）。第六团团长和党代表都记不得了。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不清楚。第七团团长一开始是谭曙卿暂兼，以后不详，团党代表蒋先云（共产党员）。第八团团长陆瑞荣，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第九团团长卫立煌，团党代表王逸常（共产党员）。

此外还有几个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后由鲁涤平继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 第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陈炯明残部洪兆麟、林虎、刘志陆、熊略等部回驻潮梅，并据潮县以叛。我留守该处的粤军，因兵力悬殊，当即撤回淡水。此时，驻在连州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约有数千人），与陈炯明部勾结，企图向广州进攻；驻在南路的邓本殷部进至阳春、恩平，亦准备向广州进攻，造成环攻的形势。国民政府为消灭各路叛军、统一广东计，九月二十八日任命蒋介石

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统率国民革命军再举东征。

我军为达到消灭东江之敌的目的，将东征作战计划分为两大作战地区：

（1）沿东江右岸东逾紫金、岐岭以达兴宁、梅县、大埔回以北地区为第一纵队作战地区。但作战初期，第一纵队须担任攻克惠州之责。因为第一纵队为我军攻敌的主力军，使之担任此地区的作战地区较为宽广，容易截断敌军向北逃遁的去路，使敌人不得不麇集海岸方面与洪兆麟、谢文炳部混杂，自相交哄，我军得以聚而死灭之。

（2）沿东江以南地区绵延东向经海丰、陆丰、揭阳、潮汕、饶平而至福建之边境，为第二纵队作战之地区，但不担任攻惠州之责，专事该方面的作战，直捣潮汕。

两作战地区，为作战上之便利起见，分配三条路线如下：

1.北路——龙门、立溪、锡场、和平、罗冈。2.中路——博罗、河源、老隆、兴宁、梅县、大埔。3.南路——淡水、海丰、揭阳、潮州。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

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

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

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

关于战斗序列，我只记得第一纵队是以党军第一师、第二师之第四团、第三师及炮兵一营，工兵连等为主，其他纵队的部队番号及兵力均不详。

九月三十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八旗会馆发表命令如下：一、潮梅残敌，近得各方的救济（特别是香港英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帮助），企图死灰复燃，确有分途向我进犯之意。二、我军为巩固革命策源地起见，拟于最近肃清东江之敌。三、各部队分期出发，集中地点应按规定严格执行。四、各纵队所属各部队的后方联络线，应由各纵队长自行筹设之。五、各部队出发后

到达集中地的时日，应立即报告。

## 攻克惠州

惠州后枕东江，前临西湖，三面环水，城高而坚，形势雄壮，夙称天险，为南方第一坚城。自唐代迄今一千余年，历经军事，从未失守。惠州县志写惠州之形势有云：“铁练锁孤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由此可知惠州的险要。故惠州为东江之要塞，军事在所必争。

当时据守惠州的是杨坤如部。杨坤如凭借险要，复加以种种副防御，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军欲平定东江，最好是先攻破惠州，惠州一下，则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矣。东征军之奏功难易，实视此城之得失为枢纽也。当出发之日，蒋介石曾在石龙致杨坤如一电，劝其输诚政府，许以自新，免得兵戎相见，殃及民众。詎料杨逆竟置不答，妄图恃险顽抗，于是我军遂决定攻打惠州。

此时，杨坤如部约二千余人在惠州府县两城固守待援。李易标、陈修爵部约三千余人，已于十月二日在老隆集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河源附近。黄任寰、练演雄等部约三千余人，亦于九月二十九日在紫金集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兰塘附近，洪兆麟、李云复部约二千余人在平山附近。谢文炳部约二千人在梅垄附近向我前进中。

我担任攻城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三师及第二师的第四团和两个炮兵营。

当时我在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我团的主要任务，是在惠州城外的东北角一带占领阵地，对河源、紫金方面之敌，严密戒备，并以一部对惠州城的东北角施行佯攻，借以牵制敌之兵力。

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时，我野炮在大牛堂占领阵地开始射击西北角一带城垣。第一师之山炮连，在下角坳附近射击北门城楼敌军

的指挥部，另一连射击敌之炮兵，统归炮兵营长陈诚指挥。第一师的另一个山炮连及第三师的炮兵营，统归炮兵营长蔡忠笏指挥。当时组织了十几个先锋队，多为营连长或党代表领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十三日午后二时，我炮火显示了很大的威力，北门城楼及其城垛被轰崩塌颇多，城楼两侧的侧防机关亦多被毁坏。我第二师的第四团步兵陆续通过北门桥，由桥下徒涉向城垣逼近者亦颇不少。同时第三师亦冒敌火冲过飞鹅岭山麓隘路，猛攻西门。是时，双方枪炮声杂作，如波涛之怒吼，如风雨之暴至。我飞机亦频临上空翱翔，散发宣传品，劝敌军官兵投降。我炮兵不时改换目标向城内猛射。这时我第四团步兵将次逼近城脚，惟敌方火力甚为剧烈，我军扛抬竹梯之勇士虽到达城脚，但死伤过半，无从登城。

午后五时半，得第四团团长刘尧宸报告，谓我团已逼近西门，被该处敌军的侧防机关向我猛烈射击，我军死伤枕藉，以致暂时停顿。何纵队长接此报告，即给刘团长命令云：“现在天将傍晚，野炮炮弹所存无几。若不于此登城，则无登城之机会矣。”刘团长得令后复奋勇指挥部队前进，躬扶竹梯，大声喊杀，与先锋队疾驰抵达城下。敌以机关枪扫射，刘团长身被数弹，血流遍体，犹大呼迅速登城，壮烈之气，风云变色。刘团长终因受伤过重，在阵地上壮烈牺牲。在第一次东征时刘是我的营长。他不仅能与士卒同甘苦，尤以打仗时总是在最前线奋勇冲杀，因而在兴宁之役受伤，其后调升第四团团长。惠州攻克后，我得知刘之噩讯，不觉热泪盈眶，十分感伤，深感革命事业损失了一员勇士。何应钦得刘团长阵亡的报告，即令该团中校团附李廉护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攻城。本晚城内敌人在西北门外一带燃火照明，如同白昼，不断向左右扫射，以防我军黑夜爬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六时，何纵队长以李代团长未能完成任务，仍调任团附原职，改令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代理团长，并面谕惠代



团长极力整顿队伍，调回北门准备攻城，同时将第三师第八团由西门调至北门协力攻城。由夜达旦，敌军不断地以火药罐、石灰瓶等向城下抛掷，复经常以火力向城外射击，及至正午始稍沉寂。午后二时，我军复发起总攻击，蒋介石亦到飞鹅岭炮兵阵地亲自指挥炮兵射击，颇多射中要点。何应钦则亲至北门前线督队环攻。是时野炮、山炮、机关枪、步枪、炸弹，密似鞭炮，声如鼎沸，约向选定之目标注射，城垣城垛及各侧防机关被我破坏者举目皆是。惟敌人之侧防机枪火力极为隐蔽，使我爬城部队死伤枕藉。营长陈诚即调山炮一连推进至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对准敌之侧防机关轰击，将其侧防火力悉行摧毁。我步兵乘敌机枪毁坏之瞬间，将竹梯迅速移至城根。是时，何应钦立即命令第四、第八两团长，迅即爬城突进。我官兵勇猛冲锋，缘梯登城者蜂拥以赴，前仆后继，敌遂纷纷溃散。午后三时五十分，我第四团健儿鼓勇先登。陈明仁那时在第四团当连长，亲率该连最先登上城墙。何应钦乘时率总预备队涌进，于是党军的旗帜遂于四时十五分迎风招展于惠州城上。

周恩来主任（那时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派政工人员向城内居民慰问。大约是十五日或十六日在城内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 向潮梅进军

惠州克复后，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于十月十六日颁发向潮梅进军的命令：以第一纵队出海丰，以第二纵队出三多祝、紫金，以第三纵队出河源，限各纵队于二十二日以前占领海丰、紫金、河源之线，二十六日以前占领河田、河婆、老隆之线；十一月三日以前第一、第二两纵队占领潮州、汕头，第三纵队出五华、兴宁向海县、大埔追击。

蒋的总指挥部于二十日进驻平山，综合各方情报判断敌情，

知敌之主力林虎所部活动于紫金、兰塘方面，遂决心增强第二纵队作战地区之兵力，抽调第一纵队之第三师，并抽调第一师的一个机关枪连和一个山炮连，由赤石向三多祝、埔新方面转进。

当时第一师独立作战，于二十二日克海丰。当我们到达海丰时，老百姓得知即是第一次东征时的教导团部队，许多人从农村赶来欢迎，盛况空前。老百姓十分热情地要我们喝茶水，吃番薯、花生等。在军民联欢会上，周恩来主任讲了话，代表军队感谢民众的热情和帮助。地方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亦热烈赞扬党军的作战英勇和纪律严明。当时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主任的指导下，确实是做得很出色的。政工队总是随同先头部队行动，每到一城市或乡镇，总是宣传军队的纪律：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等，有条件的地方还举行军民联欢会。

第二纵队于二十一日驱逐了新庵圩之敌，蒋介石当时认为中路是敌之主力所在，仍由埔新进攻龙窝。正当激战之际，南路贼匪邓本殷竭力向广州附近进逼，第四军留在该地戒备部队抵挡不住，连连告急。蒋介石乃与李济深商定，由李率第四军主力回援，蒋亲率一个独立旅及两个补充团向河源前进，留第四军之十一师在紫金待命。这时我第一师已攻占河婆，第三纵队的主力亦出河源到达老隆。

当时林虎主力集中在华阳，我第三师系由旧粤军改编成立的，素少训练，师长谭曙卿不探听虚实，也不作周密的部署，竟贸然向华阳前进，卒与敌军遭遇。敌军火力超过我数倍，兵力亦远过之。战至正午，敌以大部兵力向我左右包围，谭部陷于苦战中。蒋介石得报，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企图激励官兵，阻挡敌军的猛攻。卒以敌众我寡，敌人不断向我冲击迂回，我第一补充团团团长周保山（共产党员）奋战阵亡，官兵亦死伤甚众，形势异常危险。

时陈赓（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在第三师当连长，蒋介石对陈赓向有好感，特别指调他这个连到总指挥部担任护卫。蒋见形

势不利，立即要陈赓到前线去向谭曙卿师长传达命令，不准退却，并且要谭曙卿枪毙任何一个临阵逃跑的官兵。谭曙卿接到命令后，亲率少数部队据守一高地极力抵抗，但也无济于事，该师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曾要陈赓代理第三师师长，收集溃散的部队重新组织抵抗。但兵败如山倒，陈赓亦无能为力，连总指挥部的人员也都逃散了。蒋介石气急败坏，对陈赓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陈赓极力劝慰，并亲自背着蒋介石走了一段路。他们到达一条河边找到一条船，陈赓命自己那一连占领阵地，竭力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蒋介石渡过河去，脱出险境。总指挥部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坐轿及行李等，都丢得精光。蒋狼狈不堪，大发脾气，见人就骂。蒋写了几句话给何应钦，派陈赓去找第一军的队伍。陈赓于深夜经过崎岖的山路（在路上还遇到过狼及其他野兽），历尽艰难险阻，至第二天正午才找到何应钦、周恩来，报告华阳方面第三师失利的情况。何应钦立即派了第一团去接蒋介石，并支援第三师，使第三师得以收集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不久，军中便传开了“陈赓搭救校长”的佳话。

我第一师于二十五日占领河田后，照原定计划应派一部至琴口遮断敌之退路，并与第三师取得联络。不料为洪兆麟逆部所牵制，未能实行。当第一师进占河田时，洪部尚据鲤湖，迨二十八日得第三师华阳失利之情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命第一团留守河婆，自率第二、三两团向罗经坝威胁华阳，不期与敌军遭遇于横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时敌众我寡，但党军发扬其光荣的传统，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毙伤敌人甚多。在此同时，洪兆麟亲率所部精锐向河婆猛攻，第一团坚忍抗拒，亦大败之。林虎部既败于横冈，退定安流、双头时，我第一军第一师已出塘湖，第三师已出梅林，左翼队到达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敌军处于我军包围之中，豕突狼奔，无能为力。我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激战一整天，许多山头的争夺战往往反复数次至十多次。当时，我们那一营把敌人约千人围困两个山

头，自晨至午，往返冲杀，激战到午后二时左右，才将该敌全部解决，除毙伤的外，俘虏七百余，缴枪七、八百支。是役，第一军共计毙伤和俘虏敌军一万多，缴获敌军步枪六千多支，重机枪二十多挺及其他许多军用品。林虎、洪兆麟两逆仅率数百人乘间向汤坑方面逃去。至此，敌军其他残部闻风而逃，毫无抵抗力了。

我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于十月二十三日攻克河源之后，以一部警戒兰湖，以主力沿东江南岸向兰口进。但兰湖驻敌有相当多的兵力，我军兵力不足，接触稍受挫折，河源又陷于敌手。程潜放弃河源，照原定计划前进，于二十八日占领五华，十月三十一日克复兴宁，遂使我中路军之作战，亦收进展顺利之效果。及敌军自河婆、横流渡败走，大部分被歼缴械后，实已溃不成军，我第一纵队由普宁、揭阳进击，十一月四日克复潮州、汕头。第二纵队由汤坑、高坡进展，十一月七日进抵饶平，第三纵队于同时肃清了梅县、大埔之敌。东征军总指挥部于十一月六日抵汕头，东江地区完全平定。

敌残部共约数千人逃窜到福建边境，蒋介石计划乘胜入闽，扫除残逆。十一月十四日，我军进攻永定，俘获颇多，刘逆志陆仅以身免。时北洋军阀部队控制福建，派来使者与我军接洽，愿意负责悉数收缴退入福建境内之残敌的武器交给我军，请勿入闽。我军以苦战匝月，亦暂不准备大举入闽，遂撤回永定之师，命令全军休整待命。

东征告成，期仅一月，奏功之速，前所未有，固由于指挥统一，将士用命，而东江民众痛恨逆匪，与革命军合作，给予军事上莫大的助力，也起重要作用，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斯之谓欤！

## 统一广东

熊克武在四川失败后，率领残部来归，号称两个军，即余际唐的第一军，汤子模的第二军，实际兵力只有六、七千人，入粤后盘踞北江的连县一带。他表面上与国民政府合作，骗取政府发给的经费、武器及其他军需品，背地里却与陈炯明、林虎等勾结，图谋不轨。我从抓获的陈炯明的代表张炯万供词中，得知彼等阴谋，遂于十月一日以招宴为名，将熊克武扣留监禁。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命令云：“熊克武率部来粤，入驻连州，阳与政府合作，阴与陈逆炯明勾结，危害政府，证据确凿，亟应将其部队解决，以遏乱萌而消隐患。着由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两军各以一大部协同桂省各部队遵照计划严密实施。此令。”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奉到命令后，派鲁滌平为指挥，分兵向连州进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奉令后，即令其第一师王均部向水口圩前进，第二师朱世贵部向青莲前进，并与第二军联络，会师连州。川军节节败退，纷向湖南边境马头铺等地逃窜，于是北路遂无敌踪。

当陈逆残部侵犯东江之际，广东南路陈之余党邓本殷部亦同时来犯。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以陈铭枢（那时他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为南路军指挥官，俞作柏副之，率军讨伐。邓本殷所部兵力较我优胜，我军应付困难，国民政府军委会乃令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率第二、第三两军主力大举南征。朱培德将各部分为四路：以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陈章甫部为右侧支队。朱培德先令各路驱逐当面之敌，预备与敌会战于阳春、阳江两县之间，将其一举而歼灭之。十一月七日，陈铭枢部攻占阳江，其余各路亦分别将当面之敌击溃。十一月二十三日，俞作柏部进占廉江城，邓本殷率残部退回琼州岛（即海南岛），其余残部窜往廉州。

陈、俞两部进攻廉州，第三路戴岳部进攻雷州，均次第克复，消灭了残敌。海岸上之敌既经肃清，仅剩琼州岛邓逆本股之老巢未破。但时隔不久，我军在琼州登陆，一举攻克琼州城，邓逆本人泛舟而逃，其余残部均经收编缴械。琼州大定，南路肃清，于是多年来四分五裂，纷乱扰攘的广东，获得了完全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愈益巩固，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统一广东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我写述的仅侧重于军事，尤以自己所在的党军的作战为主。

没有孙中山先生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及创建新军，要在这样短的期间内使革命势力迅猛发展，扫荡一切反革命力量，完成广东的统一，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广东的统一，当然不可能有声势浩荡的北伐。所以广东的统一，是为北伐奠定了基础。而这一伟大的胜利，则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产物。

## 出师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令军队伙同上海流氓袭击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公开背叛革命后，紧接着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与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到七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议与共产党分裂，遂使“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汪等反共后，坚持其正统地位，与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对立，到八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重要军事会议，蒋提出对武汉用兵，暂停北伐；白崇禧则力持异议，坚主与武汉和解，继续北伐；争论正激烈，蒋忿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暂时离开一下也好。”蒋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遂愤而去职，跑回他的故乡——浙江

奉化去了。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先是国民革命军的势力进到江苏浙江地区后，蒋介石便迅即扩充他的军事势力，下令成立七个补充团，所有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当时有关麟征、李国，刘保定等。蒋介石那时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主要是步枪、重机关枪、驳壳枪等。蒋介石派其亲信蒋鼎文为宁波警备司令，买来的武器，就存放在宁波附近，预备装备这七个补充团。这七个补充团当时大部分都驻在浙江境内。蒋介石离职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完全由桂系的李、白操纵一切，他们首先要求何应钦解散新成立的七个补充团，何即遵从他们的意旨，下令解散。蒋介石在奉化闻悉此事，大为愤懑，痛骂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并大骂黄埔同学会（当时主要负责人为曾扩情）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在职的同学加以抗拒，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

紧接着，桂系又要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一带由黄埔学生带领的军队一律开往江北，防堵孙传芳军队再次渡江反攻，所遗京沪一带的防地，统交广西部队接防。蒋介石得悉此事，认为桂系阴谋是要置他的嫡系部队于死地，如不抗拒，有被歼灭的危险，这样，他也就没有政治资本了。于是蒋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黄埔同学会会长为蒋介石，曾为秘书，实际负责）立即通知团长以上的同学到上海朱绍良的家里开会，筹商对策。那时我是黄埔同学会的交通股长，曾扩情便把这一秘密任务交给我办理，此事必须避免使何应钦知道，不能用电报通知，所以我就昼夜在沪杭、京沪两线上奔波，几乎所有大站都下来去通告。

朱绍良和何应钦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同学，并同在贵州王文华下面共过事，听说那时彼此就不大融洽，一九二七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下野后，朱便到上海闲住。住的地名我记不得了，房子不怎样宽敞，二十多个人在他家的会客

室开会，挤得满满的。会议形式上由朱绍良主持，而胡宗南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他发言最多，态度慷慨激昂，对问题较能分析，获得了到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当时他的地位是第一师副师长（不久便调充第二十二师师长），其余大多是团长。他当时发言的主要意思，大略如下：

1. 校长（指蒋介石）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 李（宗仁）、白（崇禧）阴险，敬公（指何应钦）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 李、白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 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质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呀！

胡宗南这一段话，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并表示决心，如何应钦要强迫的话，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使李、白的目的和何应钦的命令不能实现。

这个会议，给何应钦一个重大打击，决定了他不能领导黄埔系的军队。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得蒋介石对他的重视，这是胡宗南以后一直被蒋介石信任和寄以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 留学日本被囚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南京复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后，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北伐，



由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的作战任务，是由徐州沿津浦铁路进攻济南、沧州、天津。日本政府田中内阁立即增兵青岛、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四月三十日，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组军（番号第四十军）及直属之第九师，击破北洋军阀张宗昌部的抵抗，攻占济南。五月二日驻在济南的日军，到处寻衅，乱放机枪大炮示威，五月四日日军残杀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并屠杀我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我方军民死伤者达四千余人。五月七日，日军司令福田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线两旁二十华里以内，同时日本又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

“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慨，上海等各大中城市成立“抗日暴行委员会”，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

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有三、四千人，大多住在东京，我们四十余人均系黄埔军校毕业的，于一九二七年冬经蒋介石派赴日本学习军事，住在东京牛亡区若松町振武会馆，先学习日文，他们推选我担任黄埔军校留日学生小组组长。日军在济南的暴行发生后，大家非常愤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议决设法举行留日学生大会进行抗议和示威，当即推定了一些人分赴有组织的团体接洽，很快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参加者三十余人。会议决定：（1）定于五月某日上午十时假神田区中华青年会馆开大会；（2）推定大会主席团十一人，并由宋希濂担任主席团主席；（3）拟定抗议宣言，经大会通过后发表；（4）允许到会的人自由发言；（5）会后游行示威，并拟定口号，制备旗帜。大约是五月十日左右的某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明确了）上午，留学生一千多人从各地区来到中华青年会馆，十时按时开会，首先由我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演，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

侵略行为，紧接着发言的有十多人，辞多愤激，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到十二点过后，准备出发游行示威时，突被日本大批警察（至少有四、五百人）包围，不仅阻止游行，而且立即抓人，有不少人纷纷散去，当场被抓的约有四百多人，到晚间大部分释放了，有三十多人被关禁于神田区警察局拘留所，到第二天又释放了十多人，剩下的被他们认为是首要分子，到现在还记得的，除我以外，有葛武荣、胡启儒、张显之、罗佩荣等。我被两个大个子警察挟着，不断地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鳞伤。说到神田区的那个拘留所，真是人间地狱：从一条小道进去，打开一道闸门，里面有八个小间，分成两排，每间长约二米五，宽约一米八，墙壁是砖砌的，门是铁条做的，地面没有日本通行铺的“榻榻米”，而是水泥地，这是最容易因潮湿而得风湿病的。每间经常关押七、八人甚至十人，被拘押的人，有政治犯、杀人犯、盗窃犯、强奸犯、酗酒犯等，犯人相对地坐着，晚间睡觉时只能靠着墙打打瞌睡，不能伸直腿，因为怕碰到对坐的人身上。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开饭，每人每次两片黑面包，一杯清水，隔两天也给两片咸萝卜。进门口处摆着一张小桌一条小板凳，供警察轮流看守之用。不许讲话。我和日本犯人被关在一间里，和其他中国同学隔离。这间囚室只有一个小窗户，光线是暗淡的，由于经常关押着五、六十人，发出蒸的热气、汗气，与隔壁厕所所透进来的臭气交织在一起，常常使人感到恶心甚至想要呕吐。有时在半夜里那来的抢劫犯、酗酒犯，大吵大闹，简直无法休息。就这样，我们十多人被整整关了三个月。当时我并不颓丧，心里总是想着我们中国被日本征服了，大家做亡国奴，这日子怎能受得了！不，我们决不能亡国，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青年们必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而奋斗！我在狱中十多天，真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痛恨极了。

大约关押了半个月，有一天上午有我国驻东京的叶领事（福建人，年六十多岁，人极忠厚）来看我们，对我们说：“经过驻

日公使几次交涉，日本外务省同意释放我们，今天就可出狱了。”大家听了当然很高兴。到十一时左右，东京的警视厅派了一辆大车把我们分别送到各自的住地。回到振武会馆，同学们都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小组同学被关的有三人）。我们不仅浑身气味浓重，而且蓬头垢面，衣服肮脏，生了一身虱子，从头发里都可随便抓出几个来，于是立即去洗澡、换衣服。

当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上书蒋总司令，请求罢学回国参加战斗，但是没有批准，要我们继续留日学习。